

音容从此隔秋风——冯其庸先生杂忆

罗丰

经学死亡了吗？这种观点今天已不必作答，因为“道之不绝在人”。凡有儒学义理处，便有经学。大道所在，便是中国。对于回到经学的声音，似乎也应该作一反思。

著 文怀念冯其庸先生，我心乔意怯。得识冯先生时，先生已至暮年，亲炙之日不多，交往时日有限，顶多十余年。而先生门生故旧甚众，自觉不须劳我等传转先生盛德于万一。不过，先生于我有知遇之恩，知交数人鼓励将所知所见写下，与人分享，不致烟消云散，亦属份内之事。

正月初九，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送冯其庸先生最后一程。中午，孙家洲教授邀参加冯先生告别仪式的朋友聚叙。席间，家洲兄以一封冯先生亲笔信见示。信有三叶，行草书写在印有“瓜饭楼”字样“宽堂白笺”上，相当讲究，时间是2005年11月3日，并加盖“冯宽堂”红印。



2012 年作者到瓜饭楼拜访冯先生留影

信中内容与我有关，家洲兄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冯先生指示他全力邀我入职人大国学院，并多有谬奖。睹物思人，又勾起我万千

思绪，激动不已。人民大学要办国学院，冯其庸先生担纲，要在 大范围内物色人员。承朋友厚爱，在冯先生面前荐我，先生认真，买一本小著读后，觉得此人

有可造之处，便延揽我加盟。以现行体制，仅凭一部书或一篇文章就赏识提携他人于牝牡骊黄之外，让人恍若隔世，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受宠若惊的我初心萌动，走进通州张家湾瓜饭楼，聆听冯先生教诲。

后自度思量，我久居僻壤，闲适有年，对纷繁的京华生活心存畏惧，便以不情之由拂先生之美意。现在看来，本来就不算用功的我，并无经得起挥霍的天才，先生错爱也没有让我发奋淬砺，更上层楼，反而慵懒之态日现。先生见我志不在此，不以为忤，未再勉强。对于我的愚钝之举，先生虽对他人表示遗憾，但在我面前却从未流露出一丝不快，雅量可感。我的粉笔生涯，还没开始

就胎死腹中。

说 来在此之前，我与冯先生还有一面之缘。1988年10月中，我在一家博物馆做事，白天接到通知，晚上有重要参观。上灯时分，博物馆拥进一队人马，为首的便是冯其庸先生。依我性格，要人来访，并不会主动凑前。上面说冯先生是专家，我又对馆里文物熟悉，尾随左右，以便备询。那晚，冯先生看得很仔细，也真的问了一些简单问题，亲切和蔼，给大家印象很好。参观完后，我以一本小册相赠，冯先生客气地请我签上名字，并称序者金维诺教授是他多年的老朋友。冯先生

(下转 10 版) ➡

➡ (上接 8 版)

冯 先生的新疆之行，有他明确的目的性，就是要感受早年传统典籍习得中的遥远西域和漫漫丝路。在他1986、1987年最早的两次新疆考察之后的游记《西域纪行》《秋游天山》中，都表达了这样的向往。后者开篇即言：“丝绸之路……尤其是新疆，古代称为西域，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地段，也是唐玄奘向印度取经的经行之地。”

如何在今天的新疆大地上体验和寻觅千百年历史中的古代西域，冯先生找到了以玄奘取经往返西域为核心的穿越之旅。十次新疆考察，他逐步深入，从玄奘西行走出今日国门的别迭里山口，到东归入境经行的瓦罕走廊，都一一考察。最后在生命禁区的罗布泊，走完了玄奘在西域的最后一处踪迹。

他的学术研究也在他称之为“西域学”的领域里结出硕果，在最为人称道的《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中，他考证了玄奘东归进入中国境内的瓦罕古道及明铁盖山口。瓦罕古道上的多个山口，究竟哪个是玄奘归途经历，因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因而众说纷纭。斯坦因以“波谜罗川”的大龙池比定作萨雷

库里湖为前提，认为玄奘是从瓦罕古道北边的排依克山口进入的。冯先生根据其在玄奘记载中的经历国家、明铁盖地名与玄奘“橐驼数千”故事的吻合，及公主堡、竭盘陀国的地望，将东归山口确定在了瓦罕古道南边的明铁盖山口，当然有其合理的因素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冯先生提出了“玄奘归国古道”的概念，除了学术的意义之外，它的认定也具有在当代中国弘扬玄奘精神、建立民族自信的现实意义。这个概念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但是多数的研究在另立新说时，用了类似“基里克和克克吐鲁克相对明铁盖要平缓得多”的理由来做替换，仍然是一种皮相之论。一方面，《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关于玄奘归来的途中，为了顺道而放弃所谓的平坦不止一处，归途中“其山叠嶂危峰、参差多状，或平或耸，势非一仪，登陟艰辛，难为备叙”的描述即其例证；另一方面，在瓦罕古道各个山口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侧，究竟道路的平坦程度如何，如果没有做过全面翔实的调查，也不可轻易否认明铁盖的说法。

对于我们而言，冯先生提出的这个概念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玄奘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帕米尔高原上物化而得以瞻仰。玄奘之路的研

究，我们至今还欠着对于这条道路的一次全程考察，而冯先生已经引领我们走过了一半。

冯 先生的新疆之行，不仅在其晚年创造了他的学术事业的一个新高，也创造了他文艺事业的新高，使他作为一名文学家的古典诗词创作更添豪放雄浑的气韵、作为一名书法家的行草更具纵横恣肆的意态、作为一名中国画家的山水更增浓墨皴染的色泽。

而他的西域学研究，也以他山之石的方式，进入了最为耕耘自适的红学园地里。在2009年新疆“7·5”事件之后的不寻常岁月，他发表了《〈红楼梦〉六十三回与中国西部的平定》的宏文。他分析《红楼梦》六十三回中贾宝玉将芳官改名为“耶律雄奴”后说的话，认为这是曹雪芹在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之后发自内心的对西部平定的歌颂。这个在《红楼梦》以批判时代为常态的例外，被冯其庸先生认为是西部平定深入人心在当代作家笔下情不自禁的流露。在对《红楼梦》的文学文字作出本色当行的细读之外，冯先生分析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自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的国内国际形势，到乾隆平定准噶尔统一天山南北的时事，也一样精确老辣。这不仅是文史互通的典型，也

是其对于西域作为中华故土的统一中国理念的学术表达。

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和道义担当，他的西域研究越走越远，甚至不惜暮年衰龄，开始带动时代的步伐。他致力于《玄奘之路》纪录片的拍摄，从1998年以来，就多方寻找合适的机会来宣传“不有艰难，何来圣僧”的文化丝路；他致力于弘扬西域学的研究，从2002年以来，就开始打报告给有关方面呼吁成立西部研究中心。在同样艰难的历程之后，他的这些愿望终成正果：2005年，《玄奘古道寻踪》由他担任首席顾问而由中央电视台开拍并播放，带动了人们对玄奘之路与玄奘精神的探求；也是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建，他被聘任为创院院长，在他的主张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也同时成立，“大国学就是新国学”的概念为国学学科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6年的年底，我得到了冯先生从医院托人捎给我的《风雨平生》的样书，几乎一口气读完。第418页，看到他叙述2005年考察罗布泊的感慨：“我的腿一直到这一年的冬天、2006年的春天才开始犯病，不能行走。……罗布泊到楼兰到白龙堆、三陇沙，这些都是靠腿走的，现在

却完全不行了。反正我也已走了不少地方了，年岁也九十多岁了，即使不能再走，我也无遗憾了。”心里蓦然一震，想起了几天前他在医院对我说的正好相反的话。是的，当他还能在清晰的思维之中遥想西域的山水却又力不从心时，他的悲哀时时会在暮年的伤痛中涌上心头；但是因为仰慕“玄奘追求佛典精义而万死不辞的勇气”，当他以八十一岁高龄在罗布泊划上了玄奘西域寻踪的句号时，后来的一切又都在所不惜。在矛盾交织的晚年，他战胜了自己，把西域圆满行程的欢欣留在了文字里，留在了可以藏之名山的传记中。

1月23日，我又走在了走过多少遍的前往张湾芳草园的路上，虽然知道那是为冯先生去送行，但又觉得先生似乎还在寓所的那把椅子上坐着等我。长路上，勉强凑成了一段挽诗：

梦里红楼别样红，
还从大漠识穷通。
我翁归去寻常事，
走遍天西再向东。

“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是冯先生西域诗的名句。我愿归去的先生，不再有人世间不良于行的苦恼，在他所倾心的漫漫丝路中，任意遨游东西。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